

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评《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

Holism and the Fundamental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ce: A Critical Review of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王红扬

Wang Hongyang

摘要:《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提供了一个站在全球视角总结并检讨当代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高水平学术作品，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检讨高水平学术本身样本。决定两个检讨的，一是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总体特征和价值“客观”上是怎样的；二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怎样的逻辑，这是评价一并预见其未来发展的基础；三是如何才能正确认知事物，这是一和二进而两个检讨的共同基础。本文力求以简明的逻辑完成全部线索的关键解答，最终初步建构整体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框架。

Abstract: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provides both a high-level academic work to review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a sample to critically review academic work itself. What underlying the two reviews are: 1) What are the “objectiv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Chinese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2) What is the proper logic demanded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basis to review 1) and anticipate its future; 3) How to properly recognize things, which is the common foundation of 1) and 2) and hence the two reviews. The paper tries to conduct the key answering of all these leads by succinct logic, and eventually accomplish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Holism.

关键词: 规划；增长；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整体主义；整体主义规划；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

Keywords: Planning; Grow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ce;

Holism; Holistic Planning; Methodology;

Epistemology; Ontology

1 一次很有意义而勇敢的学术批评实验

1.1 学术批评的必要性

约四五年前，《国际城市规划》编委会年会讨论杂志选题时，我提出国内城市规划学界缺乏高质量的学术批评，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方向。没有高质量的学术批评，学术进步的脚步一定是缓慢的：高水平学术不能进一步提升，低水平学术不断自我复制，现实中的问题则在似是而非的药方下安然不动。更大的危机在于，真正危险的谬误，往往不是仍被质疑的思想，而是某些看似无误被确信无疑的思想（包括常识）。因此，真正危险的谬误，恰恰来自于高水平学术，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这个比例可以逻辑地给出：真正的“科学”意味着穷尽严密，这显然属于极小概率），无论从表象还是内在都已具备了科学的几乎一切特征，却仍然还存在谬误，但人们却已经下意识地给予了信任。这也意味着，高水平学术中的谬误更加隐蔽、深刻并伴随着精巧的正面性特征。今天，连形式、符号意义上的“科学”都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现代宗教——无需深究实质，只要亮出“科学”标签，很多人已经跪下了，对更复杂的真实学术、理论的盲从自然更加无处不在。一些人们深信不疑的思想的谬误，往往才是社会发展难以突破的真正障碍。同时，人类和人类社会，包括制度、领导人，归根结底都是被思想塑造的；所以任何社会，归根结底都是由其中的高水平思想决定的，连低水平学术又何尝不是首先源于“高水平学术”的示范与教化？当思想者意识到了真正的真理的极小概率性，意识到了即便穷尽努力，仍然可能有疏漏甚至有深刻的谬误时，承担好自己责任的基本操守，就是始终保持对自己思想的审慎和对真诚（哪怕尖锐）的学术批评的开放。批评的这种必要性，当然同样适用于“批评”自身——批评者同样需要时刻保持审慎与自省，批评是对包括争辩双方、所有人都平等的识别谬误的必要手段^①。这不是简单地要将高水平学术拉下“神坛”，或者鼓吹科学相对论或虚无论，因为，对高水平学术的有效、

作者: 王红扬，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① 同时，无论批评还是赞扬，都免不了对比。因此，批评的直接由头可能是某一个对象，但免不了一定的开放性。

有力、有建设性的批评本身，就是高水平学术。

因此，当吴缚龙教授对我说，希望将他的新作《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以下简称《为增长而规划》)作为一块实验的靶子，一块对国际上的中国城市研究提出批评的靶子，来接受真正的学术批评时，我想到了这三个词：责任、勇气和理想。身为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建筑与规划学院巴特雷特教授（即原彼得·霍尔爵士 [Sir Peter Hall] 的教授席位）的吴老师，是中国城市规划在国际学术界的第一人，但他不安于躲进象牙塔，而希望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界承担一点责任，他希望帮助打破现今坦率说仍然总体低水平、多跟风、既缺乏深度学术批评也少有深度理论建构的研究状况。同时，中国人习惯的是大面上你好我好的中国式和谐，不同于今天的西方学术界，自由坦率的学术批评早已是学者间的自然交往方式；所以，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吴教授的这一尝试是非常有勇气的。最后，我看到的是，即便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学术地位，仍然在内心不甘于自己、不甘于中国人的学术不能攀登到最高峰的一种精神——真正的学者，如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首先面临的是对自己的自省与不满足，这种精神使得吴老师希望获得更加坦率深刻的批评，这是学术向更高理想攀登必不可少的磨砺。想清楚了这三点，我也就放下了包袱——只留下自由的对真理的辨析。否则，吴老师是我极为尊重的学长，虽然私下从无保留，但怎么能公开批评呢？况且这是一本立意成为彼得·霍尔爵士著名的《城市与区域规划》^[1]的中国版的重要著作。

1.2 在世界规划版图上定位中国规划：中国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

在中国和世界城乡规划领域，英国规划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力，一般被认为奠定了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基础。这种影响力的形成，首先当然是由于英国本身堪称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旗手”，很多原创思想、技术和实践成为全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原型，英语最终也成了全球“普通话”；进而，在城乡规划领域，英国也有着包括霍华德、格迪斯、阿伯克隆比及他们的田园城市、城市进化、伦敦和大伦敦规划直到现在的空间规划等一大批杰出的原创思想和实践。但同时，也应当意识到，以彼得·霍尔为最杰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他们以历史性的、经验性的总体考察为基础的诸多创作，具

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可读性，但原创性、科学突破性或许并不特别高，这些作品对于很多概念、观点的“定义”、传播与范式化起到了巨大作用。毕竟，原创、突破不是经常能有，甚至在规划这样一个通常被认为有点“软”的学科中，究竟能有多少原创，很多人还抱怀疑态度。同时，由于人类是一种被思想引导的动物，因此话语，特别是具备了明星效应的、概略简洁又有说服力的话语，就是天然的“影响力”。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无疑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本仅 200 页出头，以英国现代规划史为主轴，但又巧妙涵盖了更广泛的西方规划经验，带有典型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风格，内在整体逻辑并不特别严密的规划著作，因其历史叙事框架完整、内容简练，富有大量精彩的观点和逻辑，易读而有启发性，出版后几乎很快就成了关于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准入门参考书^①。

吴教授在前言中介绍了《城市与区域规划》对自己写作《为增长而规划》的影响，后者在选题、立意、方法论和结构上都借鉴了他的故去的同事对《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处理，书的标题也有明显耦合。我所看到的本书的意义，当然不只是吴教授在前言中审慎的解释^{[2]xv}，而是中国版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对于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全球规划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所发挥的作用。当然，还有一般概念上的意义，印象中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全貌的英文专著，《为增长而规划》应该是第一本^②。

一旦意识到这一高度，本书面临的挑战也就随之彰显。

(1) 并不是要为争位置而争位置，而应是争取恰当的位置——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总体特征和机制究竟是什么、如何评价才恰当？

(2) 对规划专业、学科的贡献是什么？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相对写意的历史叙事和议论其实松散地瞄着规划最基本的专业问题^③：究竟什么是城市与区域规划，规划的任务、方法是什么？比如霍尔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规划已经从“蓝图规划”转型为“过程规划”，并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具体方法。一本书当然可以有其他贡献，但对规划专业性的贡献，无疑决定着它在学科中的位置。

(3) 历史的意义从来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价值——对于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人们有理由期待：对当前和今后理论与实践的建设性启示是什么？“建设性”，意味着不是单纯批评，但真正的“立”要远比“破”更为艰难。

① 本书初版于 1975 年，邹德慈、金经元先生翻译的中文版^[1]即基于此版。1985、1992、2002 年三次改版，2010 年在马克·图德·琼斯 (Mark Tewdwr-Jones) 帮助下又改出了第五版。

② 由中译版可知，华揽洪在法国出版过关于 1949—1979 年中国城市规划的专著《重建中国》(Reconstruire La Chine)。

③ 虽然或许是归纳性回答，但丝毫不意味着容易，因为知识无法简单“通约”，好的总结、归纳的实质往往是作者自己的彻底理解、认同并吸收重构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4) 在写作方法上,如何才能有效回应上述挑战而又举重若轻地驾驭这样一个宏大而有趣的写作立意?比如,基调是经验的、简明的,怎样通过篇幅有限的经验表达宏大的主题、保证观点的真理性?怎样实现从局部到整体始终逻辑严密、前后一贯而不是逻辑松散?这方面,《为增长而规划》首先试图限定本书的有效性边界——“以中国立场写给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规划人,然后着重强调了两方面:一是“比较的姿态”(a comparative gesture)——通过选择一个与国外规划可比较的线索(而不是真的“比较研究”),使本书也可以让国外读者有感觉,这个线索就是“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二是在全貌下选择使用熟悉的“示例性”(indicative)案例、“定性”、“非正规访谈”的经验方法^{[2]xv-xvi},一定程度上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一致。放在今天我们的科研体系中,这两方面或许都算不上正规的研究方法、都要被反复拷问乃至被否定,大数据量、定量、规范化等才是很多人眼中的“科学”。然而,观点更重要,还是检验更重要?观点来自哪里?为什么忽视归纳的先天不严密性?不严密的归纳是否是我们仅有的最接近严密的逻辑?意识到这些问题,一定会对吴教授这一段方法论解释颇为感慨。

《为增长而规划》是否很好地回应了上述挑战?

2 一切为了增长的规划?《为增长而规划》的核心立论与逻辑

2.1 全书概览

不像《城市与区域规划》那样有一个引论性的第一章,《为增长而规划》开篇即快捷地进入了对中国规划的历史叙事和议论。在极简略介绍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后,第一章的重点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真正起点:以租界、半殖民地城市的规划和民国时期上海规划、南京规划(《首都计划》)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第二章是对1949—1984年间规划情况的描述和讨论,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以“中国规划体系”、“城市企业主义下的规划”、“全国与区域规划”、“新实践:新城与生态城规划”四个主题为标题,没有刻意寻求编年性地对1984年以后的中国规划进行了不同侧面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最后一章是全书的理论总结。同样仅仅200页出头,给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30余年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全貌,也给出了之前30余年的全貌,且都有很多细节和深度,以及虽用了“长焦”,仍不会细节地勾勒出了近现代规划的全貌和数千年文明中的规划印痕。即便不论本书作为第一本英文中国规划专著的开创性,仅是这样简明的全貌框架+细节的结构和夹叙夹议的方式,也必将使本书成为英语世界了解中国规划的必备参考文献。但无论对于国外或中国读者,更有意义的可能是以下两点。

一是在很短的篇幅里,包含了相当多样而又框架完整、细节生动深刻的第一手案例或事实。比如对民国时期上海法租界规划、大上海规划、上海都市规划较完整的描述和分析,解释了规划早期从市政工程性规划、建筑调控性规划到土地利用规划的内涵拓展;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与技术地位、工作程序的描述和分析,试图厘清其如何最终不再是“控制”而是“为”增长;对“规划与设计竞赛”这样一种对于解释规划如何转变为“一切为了增长”很有说服力的现象和机制的分析;对规划的商业化(commodification of planning)的描述与分析,甚至包括上海同济的“规划一条街”等有趣细节;还有对天津中新生态新城这个既是所谓新城又是所谓生态城的规划和建设情况的详细分析,以及很多其他案例的既完整又有生动细节的描述分析。其中示意的图纸和照片同样很能说明问题。相比而言,国内有些类似宏大主题的规划著述或史书,往往案例数量很大,但都是蜻蜓点水,且类型上似乎很专业,却也因为雷同而不能让人产生逐一阅读的兴趣,也不太能充分说明问题,而且常有二手内容。这显然与本书所采取的全貌下选熟悉的示例性案例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直接服务于写作意图,对案例的熟悉决定了案例的多样性和完整、生动、深刻。

二是全书非常一贯、清晰地围绕着表达和检验一个实质性理论观点:中国的规划如何成了“增长机器”的关键部分而且长期如此^{[2]xvi}。本书的这种严密性、一贯性应该说优于《城市与区域规划》。对于作者而言,“为了增长的规划”是随着时间的演变逐步形成、发展的,因此全书的每一章都在承担着这个进化中的主题的一部分角色,这为阅读带来了一种逻辑上的期待。但这是一个具体的艰巨挑战:试图用一个实质性的顶层论点,统筹中国规划的复杂庞大范畴。类似著述常出现两种状态:一种是为写史而写史,把完成时间和事件之“集”(collection)作为主要目标,完全没有顶层论点,甚至在局部观点上,不仅“集”了很多二手数据,也“集”了很多二手观点;或者拿出了顶层论点,但本质上是一些“精巧”的非实质性的论点——乍一看很对,仔细想想没有多少实质内涵,就像某些政治语言。但无论如何,庞大的范畴、可能无穷的局部论点,都决定了要想找到真理性的总体观点非常困难。可这正是科学对人的最大魅惑——看似复杂无序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极其简洁美妙的规律性,在理解和干预两方面都给人以驾驭复杂事物的钥匙。那么,在这个全书的最关键方面,吴教授找到了那把简洁美妙的解锁中国规划乃至城市发展奥秘的钥匙了吗——以“增长机器”作为覆盖当代中国规划的总论点和本质逻辑能否成立?

2.2 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精确内涵与逻辑

要清晰检查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精确梳理《为增长而

规划》的增长主义规划论，否则整个理论将处于逻辑的模糊中，从而对检查带来干扰（后面我们将会意识到，人们对这个理论的接受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逻辑的模糊）。

（1）中国的规划是为增长的。这是中国规划与西方规划的一大关键区别。西方（比如英国）的规划反增长，所以新自由主义反规划。

（2）但中国的为增长不等于为市场。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增长机器的新模式。西方规划之所以反增长，实质是西方规划反市场，新自由主义试图削弱规划、保增长也就是在维护市场。

（3）中国的增长或增长机器（请注意，这是两个名词，但在书中基本视为同一）是中国治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增长机器既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结果——由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分税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企业家化的，也是长期现代化诉求的一部分——增长被认为是通往一个现代化的更强大国家的关键路径。因为中国的增长和增长机器是政治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只是被政治经济用来服务增长，所以中国的为增长不等于为市场；但因为市场本身站在增长一边，所以中国的增长机器包含着市场，但还包含着比市场更强大的力量——中国的增长机器是政治经济主导的政治经济与市场的合谋。

（4）政府和资本通过增长或增长机器获利，另一部分群体和公共利益则通过增长或增长机器被剥削。

上述四点包括了《为增长而规划》的核心论点，以及作者所认为这些论点的理论创新或理论贡献，并且所有观点似乎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在书中，这些论点实际上得到了新中国之后（即第二章之后）几乎所有经验的证明。第二章的1949—1984年时期的标题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规划”，这一称谓既是为了在西方语境下可理解，但显然也是作者观点的重要体现，因为从1984年之后就是“市场转型期的规划”，市场力量与中国体制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增长机器、企业家城市。但作者笔下1949—1984年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在本质逻辑上基本还是“为了增长的规划”：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辅助，同样要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反增长；但是增长机器机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与后面增长机器的原因异曲同工：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使市政府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

因为不会获利^{[2]42,43}；但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规划处在“政治家的压力下”^{[2]20}。第三、四、五、六章，则是完全围绕着中国式增长机器的故事，作者认为，从市场化改革的开始，到土地市场化^①、住房商品化，增长机器、城市企业家化逐步完全成型，原有规划体系不能适应市场化需求，各种非法定规划，包括战略规划、新农村建设或城乡统筹规划、（非法定的）区域规划，以及新型规划形式、空间概念，如规划与设计竞赛、新城、生态城等，在书中均被解释为服务于增长机器，为企业家城市获取利润，而国家制定土地管理法，提出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则都是为了对抗地方的增长欲望。

不过这些细节暂时不重要，人们首先感兴趣的一定是增长主义规划论所隐含的价值含义——它是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总体模式的概括和批评，并最终指向城市规划和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增长主义规划论认为它们的本质逻辑都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为资本积累服务。严谨的学术不可能回避直白，获得真理的基本前提之一一定是真诚。但直白地说出来的这个价值结论显然不仅有点敏感而且令人伤怀，阅读全书，可以发现吴教授对接受这个结论实际上非常谨慎乃至纠结。他显然避免直接以结论的形式陈述价值判断，在前言和结论两次委婉地这样说（略有差异地）：“……对于中国规划的未来，源自‘为了增长的规划’的合法性将不足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2]xvi}，“规划不一定是‘增长的敌人’，这个中国例外并不足以自证正当性”^{[2]209}。而且，他似乎努力在为这个结论寻求正当性辩护——提出“规划是增长机器的关键玩家的当前角色，与它的长期特征相关；增长被认为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路径”^{[2]xvi}，在我看来是他努力寻找这种辩护的结果之一。但他无法否定他的经验和逻辑呈现给他的“真相”，所以他一方面尽力贯彻西方学术的一个基本原则——只呈现客观，不作价值判断^②，另一方面全书的很多细节还是有意无意更直白地表达出了价值判断，比如在说到因为增长导向+分税制导致企业家化的城市想方设法利用规划获取土地的交换价值时，书中写道“城乡统筹规划由地方政府在‘企业家城市’的驱动下编制，但以‘科学发展观’的名义伪装与合法化”^{[2]59}；在分析战略规划的出现、规划的市场化等问题时，书中分析了规划如何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和配合地方政府的“隐蔽”目的——增长机器的目的^{[2]114}；在接近结论性的一段分析中，提出中国基于剥夺农

①书中对土地市场化、土地管理法的时间方面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即颁布，1988年第一次修订，开始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8年是第二次修订。

②这在远远更为成熟、更高水平的西方学术中已经成为一个好的传统，当然在另一方面，这也常常成为一个巧妙的伪装——貌似客观、不作评价，实际上已经在“客观叙事”中把价值观的私货给出去了。实际上，任何客观都是主观介入、选择的结果，都一定包含着价值指向。所以，让客观归客观、价值归价值的本质，要么是思想上已经接受了被叙述的客观的价值中性属性，要么是明确说明客观的价值含义但是提醒指出，即并不是用回避价值判断来故作价值中立。

民土地、垄断土地发展以最大化交换价值的“‘城市’积累模型”，加剧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趋势^{[2][209]}，等等。所以，批评性是清楚的。这类观点，有时在中国的学术圈里，还会多少有点“为政治讳”的心态，即因为触到了政治敏感性而不再深究。然而，“为政治讳”不能解决问题，真理才是学术的灵魂，如果真相就是这样，自然回避不了，而必须面对它然后解决问题。但问题在于：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这无关话题的政治敏感性——真相不受政治绑架，当然也不受道德、情绪等任何其他因素的绑架。

3 增长主义规划论的“逻辑紧张”

需要进一步检验增长主义规划论吗？《为增长而规划》似乎给出了难以辩驳的理由，更难证伪的是，如果将其视为对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一部分现象的归纳。况且，增长机器理论并不是吴教授的发明，而是莫洛奇（Harvey Molotch）1976年初创，后经他和另一位著名城市研究学者洛根（John Logan）共同完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理论。但如果没问题，本文开篇对学术批评的必要性的分析也就没有必要了。请允许笔者再重复一遍：高水平学术的绝大部分仍然还存在谬误。至于经验检验，如果我们意识到以这么大的总量，或许无论什么解释都能找到足够多的样本，这更应让我们警惕经验方法可能存在的陷阱。实际上，所有的经验，最终都仍然是服务于逻辑（包括经验检验本质是归纳逻辑），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逻辑。所以真正的挑战，是找到有效的检验逻辑（如果希望找到正确的答案，则还有另一个挑战：有效的对答案的猜想）。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逻辑的冲突或“紧张”（tension，借用库恩的说法^[3]，因为更具有普遍的准确性）揭示，答案归根到底是通过了彻底的逻辑检验的猜想。

3.1 已不再新鲜的理论的一般性疑问

增长主义规划论以及增长主义对中国已经不是新鲜概念，理论界已经开始讨论“增长主义的终结”^[1]。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国家更明确地提出要保增长，城市也还在强调保增长，甚至这其实是今天包括发展中的亚洲、发达的欧洲等在内的全球性优先议题。这是不是——

(1) 恰好证明了理论？证明了全球都已经增长机器化？就像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5]？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似乎站在新自由主义一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站在市场一边？

(2) 或者增长主义只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价值上是中性

的？这显然并不是增长机器理论的真实状态。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人们又何必如此关心这个事实的意义？

(3) 或者根本问题不是要不要增长，而是过于追求增长？即，增长不是问题，但是过于追求增长是问题，由于追求增长损害其他利益是问题。这也不是理论的事实，理论没有这样委婉或模糊；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基于这一立场接受这个理论。然而如果是这样，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怎样的增长才是恰当的，即怎样的剥削是恰当的甚至正当的、“有功”^[2]的？这不仅对前文解读的增长主义规划论的价值立场具有了某种颠覆性，还意味着一个技术难题，比如，怎样的增长率是正当的，7%还是6%？不同的地方，由于情况千差万别，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共同标准。也就是，即使理论上退后一步——认同增长还是可以有的，只是不能过度——之后也不可能有更清晰的答案。

3.2 实践者的困惑

另一方面，就像《为增长而规划》一书所描述的，现实中我们很多规划师、学者、政府官员都同意中国是一种增长主义规划，并且义正词严发出批评的声音。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仍然基本是同一批人做的，这真的意味着中国的规划精英们在面对实际利益时的两面性，或者他们不自觉地但实际上站在了增长受益者的立场上？多么可怕的隐蔽秩序啊！

但在另外的场合——或者是他们自己面对这样的批评，或者是他们意识到对中国规划、发展的普遍性批评时，他们以及更多的中国规划人也会本能地发出辩护的声音：中国的规划、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只考虑开发商利益，我们认真考虑了公共利益；虽然的确存在很多不公平现象，但不应以偏概全。

这就显现出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同一批人，在面对增长机器理论时，觉得理论好像是对的，但在另一个场合又怀疑呢？

3.3 经验的困惑：以偏概全？

一方面，中国的城市、乡村的确有很多对自身处境的抱怨，但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增长机器理论，无疑社会的大多数都有愤怒的理由，但中国社会的不满意程度显然没有那么高，难道只是洗脑的结果？中国的发展显然还不理想，社会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且有数据和研究还在显示问题的加剧，但

① 例如张京祥和罗震东的《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4]。

② 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刘少奇有过“剥削有功”的说法。

是发展的总体获益面、公共利益性无论与中国自身纵向比较还是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似乎不是那么差。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思考中国基尼系数拉大的原因究竟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对低收入人群的剥削，还是整体都在提高的情况下，机会不均、发展红利的扩散不够快加上个体、家庭差异及其累积而导致的部分群体的上升速度跟不上其他群体？这个问题涉及更深刻的理论问题：包括剥削在内的财富转移可以带来财富，但是没有财富转移，是否就不会产生财富？财富的根本来源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中国发展的普遍情况，似乎对增长主义规划论的价值判断（增长是一种剥削机制）提出了挑战（当然，即便以偏概全地指出了一些问题仍然是重要的），但对追求增长没有异议。也就是，逻辑的紧张，主要出现在了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第（4）点（见本文 2.2 节）。

3.4 规划的专业技术性与独立价值的丢失？

阅读《为增长而规划》的整个过程，开始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会或多或少感受到规划的专业技术性——关于中国规划的工程设施性、空间布局性，关于规划的体系和程序，关于区域规划的内容与方法，等等，但越到后面及至读完了全书，规划专业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规划的专业技术性丢失了，阅读过程中似乎读到过的专业技术性也消失了——规划师很难想起对于自己做好规划这件事新学到了什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全书似乎更像是哈维《新自由主义》一类的书，这是本书与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一个很大区别——当然，不排除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在专业技术方面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给本领域的，且提出中国的规划本质是增长机器的关键零件，而西方规划是反增长机器的（至少本来是），也是一种“规划的理论”（theory of planning）^[6]。最后，该书总结的规划的性质，基本是依附性的——规划依附于政治经济，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直白地把这个结论说出来，恐怕还是会让很多规划师感到沮丧。然而，社会经济领域，有什么东西不依附于政治经济呢？但果真如此、果真一切都是政治经济的附庸，那如何才能改变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如何可能进步？

3.5 万能的解释力（heuristic power）？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理论起点：增长机器理论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最后，让我们回到《为增长而规划》的理论起点：增长机器理论和自认源起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增长机器理论包含着空间、空间分层、空间的使用价值、空间的交换价值、不同的玩家，辅以手段、营销、成本等等

概念组成，但整个理论大体可以简化为五个关键词：开发、空间发展（增长）、空间交换、一部分人获益、一部分人受损。

即，政府和市场通过投入各种谋划、诱导及其他开发行动，使空间得到发展，从而产生更高交换价值，政府、开发商通过交换价值获益，而原有居民则被剥削了。现在，只看这五个关键词，我们大概已经发现：增长机器不就是城市开发吗？恭喜你——你已经发现了增长机器理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原因之一。强大的解释力可以意味着理论的普适性，但也可能意味着理论只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简单事物。现在，我们把上面五个关键词做一下变形，进一步简化为两个关键词：空间变得更好、居民迁移。

我们发现了什么？稳定不变当然也可以是一种美好，但空间变得更好、居民迁移，似乎也的确是伴随文明进步（让我们换一个词，不再用“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至少并不一定是邪恶的。疑问就来了：很普通的城市发展何以就成了增长机器了呢？

是角色的加入，以及更特定的，受损角色的加入。城市增长机器的本意似应特指那些使一部分原住民利益受损的城市开发项目和行为。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在的增长机器理论是一个被泛化了从而以偏概全的理论。

那么增长机器概念何以被泛化？首先，不泛化，增长机器理论的解释力就没有现在这么大。但笔者不认为理论被泛化是这样一个动机的刻意结果。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当把角色加入了空间过程时，也就是上面的五个关键词中，本来出问题的是第五个关键词“一部分人受损”，其他的四个关键词在基本意义上应是中性的，或者说整个事件的本质是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受损似乎源于获益人以及整个过程，从而使前面四个关键词都变得负面化了。价值/道德色彩一旦引入，很快就会赢得一些特定道德立场者的欢迎，在这部分人的思维中，利润、市场、开发、资本等永远都是贬义的。况且如何确切度量获益和受损本身又很难，于是，增长机器理论的泛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占领道德高地”现象对增长机器理论失去应有的客观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什么社会普遍存在“占领道德高地”现象？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理论被扭曲现象就会一再出现。

无论如何，这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具有几乎万能的解释力的概念，它们似乎处处适用，似乎解释出了世界的决定性规律。增长机器理论的背后，是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这同样是一个似乎可以解释一切、决定一切的分析框架。笔者发现，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是吴缚龙教授分析城市问题、规划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范式——增长机器或中国规划的一切

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决定的，“没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规划系统的转型如何可能发生？”^{[2][209]}，规划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范式并不一定就错了，但正因为范式如此基本，人们需要格外谨慎^[7]。

这条线索上更早的万能的解释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实际上洛根和莫洛奇正是从对这种万能的解释力的批评开始了他们对增长机器理论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看起来有些‘脆弱’：太多东西能通过资本积累的展开而得到解释。”^{[8][19]}洛根和莫洛奇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脆弱”的一个突破，只是我们刚刚似乎发现，增长机器也拥有同样的神奇。当然，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概念，比如异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深入分析这类概念的实质，还是很容易看出，相比于我们刚才解构的增长机器，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不少概念，对当时以及今天的发展，具备远远更为强大的不可替代的有效的解释力。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这些概念，真的解释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吗？为什么资本、市场，似乎干脆被确定性地贬义化了，但反过来，几乎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生产力、经济基础，为什么又长期直接是褒义化的（尤其在中国）？

4 整体性：所谓增长主义规划与发展的本质与正确解决

4.1 增长的完整逻辑与整体性^①

有效的检验逻辑，可以让我们发现增长主义规划论乃至增长机器理论显性和潜在的各种逻辑紧张。但检验只能发现已经存在的理论的问题，却不能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后者有赖于灵感找到经得起穷尽检验的猜想。笔者找到的这样一个猜想，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纯粹逻辑。我们从这一切的起点——增长——开始。

中国的规划真的“一切为了增长”吗？一方面，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人的需求、社会服务，都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增长，所以，是一切为增长，还是同时也在为社会、为环境、为人？对于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们，他们其实不需要诸如马克思主义等的抽象名词和理论，最朴素本质的理由无疑是“一切为了增长，增长为了一切”。另一方面，增长的机制是什么？是有序而智慧的社会，是人，是好的环境。所以，真正“为了增长”，就需要帮助社会、优化环境。这让我们从两个方

面都到达了同一个结论：增长与其他目的的统一性，增长与其他目的处于一个彼此依存的整体中。

同样，一方面，政府获取利益是为了什么？另一方面，政府如何才能可持续地、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如此，我们就能意识到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在机制上的统一性、整体性。进而我们意识到，虽然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冲突的情况经常发生，但损害公共利益的政府实质也在损害自身利益，它的本质是没有真正理解自身利益的机制而导致的违背自身目的的行为。理解了这一点，就更容易让我们回归“政府”、“政治”的本质：纯粹个体的集合难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在个体本身有差异的同时，所有个体也有内在逻辑意愿让渡一部分权利来实现一定程度的集体意志、集体能力和集体行为，这才是政府、政治的起点。结合政府、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机制，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政府、政治不存在原罪，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有着基本的正当性，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其实统一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将上述逻辑应用于增长机器理论。显然，在彻底的逻辑上，企业主与员工、与社会、与政府的利益是统一的，所以最成功的企业几乎很少例外不是“天地人和”的。这同时提醒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某一方不追求利益，“利益”同样是一个本源中性或者说正面的概念，“利益”不过是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表现。

也就是，无论增长还是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政府利益还是公共利益，企业家还是其他人群，它们都处于具有利益统一性的有机整体中：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之间，不存在天生的对立关系，也没有哪一方、哪一个诉求存在天生的原罪——即一定意义上自利即是利他。由此，我们已经触及解开增长主义规划论相关困惑的核心概念：整体！没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体，只不过，通常的理解远远没有穷尽这一事物的复杂内涵。

4.1.1 整体

整体是构成一个事物的相关局部的总和^②。一切事物都是一个整体，但今天的人们习惯于从事物的局部去理解一个事物，并将局部理解为独立的、自我的、先验的（从而彼此间的基本属性是对立的）。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现有的认知逻辑基本是线性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都是），比如先有局部再有整体，但实际上局部是整体的局部（脱离了整体

① 书中有几次提到了笔者的整体观与规划^{[2][194,195]}，但因为主要是从具体规划和交流而获得的印象，解释并不准确。

② 整体的基本形态是单层次整体，复杂的整体具有多层次，核心圈层的局部与外层局部性质会有差别，但本文不再额外解释。关于事物和局部：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某个事物，比如“城市”、“演化”，而“整体”这个概念同样也是一个事物；局部当然也是事物，也可以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比如“研究”中的“方法”、“范畴”、“范式”等都是“研究”的局部。

不是这个局部，从而脱离了其他局部也不是这个局部)、整体是局部之和(不说局部也确定不了整体)，整体和局部之间本质是一种彼此确认的同时性逻辑^①。

4.1.2 全部

事物并不可能逃脱自己的本质性，所以人们经常意识到“整体”，意识到必须“整体”，包括国家不同时期以不同概念提出的“五个统筹”、“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等，其实所指向的是同一件事：要统筹兼顾发展的整体。但通常来说，经由事物本性所认识到的整体，既不完全且模糊不清。常识的直觉的对整体的理解是“全部”。意识到“全部”不容易，因为事物常常非常复杂，且事物的很多方面常常难以察觉，比如思想中的隐蔽范式等。但更具挑战的是，没有对“整体性”的认知(见下文4.1.3节)，对“全部”的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整体割裂后的拼贴(就像“多规”后的“合一”，或“多学科”后的“通识”)、一种“全部局部”。“全部”本身往往不可能穷尽，并且拼贴的全部，即便努力穷尽，最终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规划变成无所不包的“everything”^[9]，成果越来越厚，但人们却没有发现规划质量提高了多少，政府越管越多，但人们也没有发现越管越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4.1.3 整体性

整体的根本属性是“整体性”，即整体内的局部基于特定关联关系相依相生、共同导向同时又受制于总和功能的属性，全部局部间的关联关系均符合某种统一的整体逻辑(比如人体的所有器官，都指向对人的生命力的支持)。也就是，整体的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依存、互为制约的关系，一种“整体关系链”。整体性的含义包括：(1)局部、整体均非独立存在，而相互依存于其他局部、依存于整体。所以，由于“为增长”是社会演变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因此实质上没有独立的“为增长”，“为增长”一定也在影响和受影响于社会的其他方面；(2)整体不是各种局部的“堆砌”，而是各种局部之间基于某种有机关系的整合。比如我们的城市道路建设，投入巨大，但如果彼此没有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系统，就会连道路本身都在制造新的交通混乱。城市中的一切建设皆然；(3)彼此相依相生的关系，常常意味着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并没有先验的等级关系、决定关系，没有哪一个局部是上帝，很难一般地说孰轻孰重，但每一局部也都具有一定意义。比如，环境

决定论固然不对，但是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同样也不对；实际上，环境、经济、社会都有一定作用，但它们的作用并没有先验的孰轻孰重；(4)局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也没有先验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统一性的可能。构建这种统一性，是局部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所以，西方规划真的反增长吗？

4.1.4 事物的理想状态是整体的有机和谐；最优整体存在多重属性；整体是特定的

整体性意味着，在最彻底的逻辑上，整体中任一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也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它来自于整体达到最有机和谐的状态。但每一个具体整体由于内部局部的不同，情况都不一样，从而最优状态都是特定的(比如不同地方千差万别)。同时，事物间的关联关系并不总是唯一确定的答案 $1+1=2$ ，而是存在着多结论、概率、范畴、弹性以及没有结论等多种情况，人们通常习惯于对任何问题都去寻找唯一答案、确定答案，而不理解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是事物的属性，结果就会推演出极端答案，比如认为规划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规划需要一成不变得到实施，对事物的评价倾向于找到一个标签(比如对政策的评价或者为“左”，或者为“右”)，对计划或市场要么反计划要么反市场，希望最恰当的“增长”最好也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不是原则。很多时候很难有唯一、确定的答案并不意味着没有答案，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本身就是答案，如果应当是弹性答案的，给出弹性答案就是非常确切的答案；同时，即便如此复杂，完美的整体性事实上普遍存在，比如宇宙系统、生命体，最好的知识也是。整体是局部的总和，局部不同，整体也就不同。因此，整体总是特定的。不同的整体可能具有同样的属性，但显然，其他整体的属性运用于此整体时，只能视为猜想(有可能适用)。

4.1.5 正确的干预是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

那么，提升某一局部利益，既可能促进其他局部，也要求提升其他局部、提升整体，是不是意味着干预总是要整体全部干预？这是现实中规划越来越无所不包、大政府愈演愈烈这类现象的逻辑根源之一。但因为这里似乎有逻辑的必然，所以“无所不包”倾向的存在绝非单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个普遍挑战；现代规划理论在发展到1960年代后，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倾向，而被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阿伦·威尔达斯基(Aaron Wildavsky)质疑“*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如果规划是一切，

^① 这里，如果暂时不太好理解同时性逻辑，可以先这样理解一下线性逻辑或演绎逻辑：演绎逻辑要求不断上溯，直至寻求第一前提，直至客观，但实际上人的认知中永远不存在人之外的客观，所以人的认知实际上是各种感知的整体集合——依靠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建立了对一切的认知或者说建立了一切。现有的普遍的线性逻辑当然源自现有的教育，其中的本体论、认识论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整体概念。

那它就可能等于零）。显然，以时、空视角看，干预永远只能是局部的，那是不是整体性根本不具备实践性、人们不可能目标于最优整体而行为？答案在于：一是最优整体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局部都要改变；二是由于事物具有局部相互作用的“整体性”，一个局部的改变会通过“衍生效应”或“链式反应”影响到其他局部和整体；三是事物的整体“演变”包括“过程/时间”维度，从而最优整体的“演变”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每个阶段最优整体的累积，所以正确的干预总是在寻找此刻边际效益最大的局部干预（类似此刻的主要矛盾）。这三个方面决定了干预不仅只能局部，而且应当是局部的，但是需要在理解整体逻辑、理解局部演变的整体效应的基础上，思考干预哪个或哪些局部，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这些局部。因此，寻求整体效应尽可能最优的局部干预，才是干预的正确原则。即，“局部化”具有必然性，但合理的局部化始终不应忘了“整体效应”，所谓致力于增长的任何干预，都会有社会效应、环境效应等，它们然后又反作用于增长，所以总和效应最优是最佳选择和目的。

4.1.6 有限整体与无限整体，猜想，同时性逻辑

局部与局部之间、与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直至整体性的关联关系，不是先验分等级的也不是先验对立的，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是统一的，这来自于最和谐有机整体的构建，要通过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实现，但这些抽象原则除了说明增长主义规划论的相关误区，以及用作对是否是最优整体、最优干预的检验，却不能告诉我们从哪里入手寻找最优整体、最优干预。这里需要区分一下有限整体和无限整体。要素有限且已知的整体，如简单的技术性、工程性事物，相对存在着更确切的“套用”已知方法的可能，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涉及要素无限，即便常规理解中的同一要素，实际在不同地方也完全不一样，如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要素间关联关系也极其复杂多变，此时寻找最优整体、最优干预的基本方法必须更彻底地回归基本思维方法——猜想与检验^①。并且由于问题的各方面没有纯粹的先验性、独立性，且每一方面的意义也是在彼此依存中体现出来的，因此猜想的进行、各个方面的意义的理解都需要引入同时性逻辑而不是线性逻辑。

4.1.7 整体是世界的本体

人对世界的感知、理解归根到底全部是基于感知的同时性的关系链，起点是一些无意义的偶然主观（比如某种感觉，

或无意中发出的某个声音），随着关系链的构筑而逐步建立了意义，建立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感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获得的意义全部是随机的，而是所有关系之间的彼此依存和制约，最后会到达某种特定的整体性状态，就像所有的语言系统、意义系统，一开始似乎独立发展，但最后却能达到很高的统一性，虽然并不排除其中一定的多样性（即关系属性并不都是 $1+1=2$ ）。事物的意义来自于它所处的整体性，是它在这个整体性中的角色。在城市发展，人们常常误解土地收益的本质，要求“同地同权”的人觉得这个收益就是土地使用者或占有者的，却没有看到城市土地价值生成的整体机制是人们在城市以集聚效应的劳动创造更多财富，所以这个“区位”的价值是获取集聚效应的财富增值，从而其价值实质来自于创造了这个具有集聚效应的区位的人，这显然是城市的广大劳动者；对于政府收取出让金，也只看到钱进了政府的口袋里，看不到整体意义上出让金是政府替全民收取、是公共财政（当然，一旦政府不将公共财政公共使用，也就同样破坏了其中的最优整体性，最终也将危及自身的合法性）；当涉及拆迁人群，人们往往也只看到他们的实物损失和重置代价，却看不到他们社会环境的损失、选择权的损失等等。无论如何，只有充分理解了整体逻辑，进而找到相对最优的整体逻辑，才能提出对所有方都相对最有利的解决方案。

4.2 中国规划、发展的问题不是“为增长”，而是如何才是“真正为增长”

整体和整体性的完整内涵使我们可以理解，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事物，而是处于一种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中。“真正为增长”，一定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合理照顾，一定包含着增长的收益合理地投入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一定包含着始终努力让整体社会结构、功能结构、生态结构等处于最优状态；若非如此，其他短板、整体系统不同步提升反过来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毋庸置疑，中国的规划、发展存在问题，但将问题归结为关注了某个方面比如“增长”，这种看法强化了各方面之间的对立性，忽略了局部具有整体效应，忽略了局部与整体、局部与局部之间互为支撑和制约的统一性。在这一思维下，未来问题的解决之道就会从“为增长”转为“为社会”或者“为生态”（比如“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从而政策行为就很容易过于简单地要么这个极端要么那个极端。将问题归结为“没有统筹兼顾”，似乎可以；但究竟什么是

^① 对于无限整体而言，实际上局部进而整体（整体本身是局部的集合）不可穷尽，所以任何对局部和整体的解释其实都具有一定的权宜性和猜想性。

“统筹兼顾”？是不是各个方面都要“撒点胡椒面”？在没有正确理解整体性概念之前，统筹兼顾往往实际上成为各个局部都照顾到、都妥协，最后真正的整体和整体性还是没有。正确的统筹兼顾，答案只有一个：整体性最优！同样，什么是最优局部，比如最优增长？答案仍然只有一个：整体性最优的增长。所以，“最优局部” = (真正的)“统筹兼顾” =

“整体性最优”。中国规划、发展的问题是什么？正确回答可以是“整体性不够好”，但在整体性概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与现有逻辑具有延续性（从而也肯定了过去和现在的积极方面），又能够从逻辑上启示正确改进的回答则是

“没有能够最好地为增长”，即，增长依赖于包括资金、市场、劳动力以及教育、文化、制度、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整体支撑，真正为增长，就应该系统分析支撑增长的整体基础，针对这个整体的短板或结构精准施策，而不是否定增长或其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以，第一，让我们清晰地证伪：问题不是“为增长”；第二，让我们建设性地指出：问题是如何才是“真正为增长”。

同样的逻辑也告诉我们，所谓过去若干年处于“增长主义时代”，那时候增长是不是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实现了最好的增长？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果更好地理解了增长的整体机制，实现了全社会、全要素、政治经济体系全方位更好的整体结构性提升，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增长。当然，纵向横向比较，虽然没有做到最理想，但中国已经足够优秀。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真正为增长”，也就是整体性最优的局部干预？对整体性的阐释给出了获取答案的方法论，普遍意义上也只能有共同的方法论，因为城市与社会发展是一类无限整体，没有唯一确定的标准答案。同时，在具体情况下寻找具体答案时，不应忘记很多时候没有唯一确定答案，而可能有多种可能性、弹性，这要求我们在面对不同方案时要有宽容的准备。

在寻求真正为增长、整体性最优的解决时，需要宽容的另一个问题是：真正的统筹兼顾、整体性最优是否意味着某种“绝对公平”，即不同方面绝对公平获益？（1）在演变的过程中，由于干预、演变总是由某个局部、某个时间开始，所以受益方存在先后是逻辑的必然；（2）从结果来看，可以存在某种所有局部都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此时的最优整体，各局部之间常常是有机分工整合的关系，所以各方之间很难直接比较，绝对公平就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3）第三种对公平的评价，来自于以某个“完美整体”为参照系，各局部符合的程度代表着公平程度，但如果意识到不同的整体意味着不同的最优整体性，也就是不应先验确定彼整体是我整体的标准、归宿，那么这种评估显然也没有确切的合理性（除非对象本来就是“有限整体”）。所以，“绝

对公平”概念是一个伪命题，真正合理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最优整体性（这并未否定局部，因为整体本身是由局部构成）。认识不到“绝对公平”的伪命题性质，所有局部都要求自身、此刻利益的绝对公平，不愿意付出有限的局部“牺牲”去换取整体性的优化，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意识到局部利益的整体性和整体优化的过程不可能绝对公平，从而局部愿意付出必要的牺牲，这才是道德的正确逻辑。类似“绝对公平”的诉求隐含的是强调局部之间的“对立”性，结果就会导致“破坏性民主”——总在强调不公平、总在强调整体的各局部间的对立性、独立性，并因此永远都能够找到理由，进而阻滞整体性优化过程的发生，然后矛盾更容易找到，最终进入矛盾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与之对应的则是“建设性民主”，意识到局部之间的命运共同体性，意识到考量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始终不忘他方利益和整体利益，并彼此愿意适度包容和牺牲。

那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存在利益不公平受损的群体？当然存在。但这首先是成本与收益的分摊与分配的问题，而不是否定城市化、城市发展这个进程本身；这个进程本身的内在逻辑所指向的也是整体性最优，因为这对每一方也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向。但在未能理解复杂的整体性的情况下，我们的制度设计的确不够“远谋”，最终也让政策和政府自身以及发展进程都受到冲击。在笔者看来，中国发展最忽略的“整体效应最优的局部干预”，一是整体制度设计没有将发展红利更好地导向并普惠于全社会公民，而是过多地进入狭义的生产部门，对人的发展、稳步推进的福利化（从而消费、创新）是生产整体的核心组成部分重视不够；二是政策等方面没有让持续的诚实劳动和整体性最优的增长成为上升的主要通道，而是始终给投机留下了巨大空间；三是没有让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制度等的整体性的提升成为更加主动积极的政策导向，而市场自觉地意识到这点并传导开来会比较缓慢——虽然这也是市场的内在需求。

4.3 规划的独立价值、专业技术性与真正挑战

规划一定是依附于政治经济的吗？现在的答案是：始终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但政治经济同样也受到包括规划在内的社会其他局部（包括思想、文化、外来舆论、自然环境、历史等等）的制约。在此关联的各种局部中，除了笔者以为思想具有先导性并有能力具有独立性（当然人们总是愿意强调其受制于其他因素），没有哪一个是真正决定性的。但在相互关联的整体中，包括规划在内的所有局部也都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每一局部的独立价值在于它是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基于自身的整体效应发挥着影响整体塑造的作用。这告诉我们，因为整体包括很多局部，从而让每个

局部变成整体或其他局部，例如让规划变成政策、变成经济、最终变成“everything”并不符合事物的内在逻辑，规划要清晰定位自己是人类社会整体中哪个不可或缺的局部，在那个局部努力做到整体效应最优。

答案其实清晰：物质空间和对物质空间的安排正是规划的领地，但规划要让自己的局部尽可能协调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科学的政策……归根到底规划要让自己的局部最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态发展的整体。这个答案在规划诞生之初在理论和实践的实际性质上曾经清晰，但由于对普遍联系的世界的内在逻辑的理解并不透彻，理论进行了无效的简单化和复杂化^①，导致了自我角色的混乱；但在实践领域，因为面对客观的整体效应，尽管在形式、方法、工具等方面不断变化，但实质上从来没有远离物质空间规划，问题只在于是否做到了力求整体效应最优的物质空间规划。真正的规律，理论上说不说它都在那里。规划的专业技术性，在于以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自然整体的关联关系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通过整体性思维，找到帮助社会、经济、自然实现整体性最优的物质空间解决方案。这个任务极具挑战性，就像最好的为增长，需要既要增长，又要社会发展、环境发展；就像可持续发展，难在要让常常看似冲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统一起来、彼此增益；就像新型城镇化，不是只要绿水青山，而是要将“增长”和“新型”统一起来。是的，很多事情不是单靠规划就能解决，但规划的任务是：如何从自身这个局部作出正面的贡献而不是成为拙劣的非整体性解决的共谋？

4.4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因为整体中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具有关联性、统一性，所以从空间一定可以解释出一定的经济逻辑、社会逻辑；反过来，从经济、社会等其他局部，同样也可以解释出一定的空间逻辑。整体具有某种所有局部间共通的整体逻辑，所以，从任何一个具有整体关联性的局部都一定可以解释出某种整体逻辑。也就是，事物的整体性本质决定了一定可以有诸如空间生产、空间的政治经济性这类逻辑，而且解释力惊人。在人们只是看到了局部是局部，而没有看到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相关性时，解释出其中的相关性，而且是非常深刻、有趣的相关性（或者说整体效应），的确是对认知的巨大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对货币运行逻辑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发现，韦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经济、社会效应的发现。但是，在没有注意到事物的“整体—局部关联”属性，没有

建立起真正的整体观时，对局部的整体效应的理论发现（比如空间的政治经济属性）就可能导致对局部的重要性的过度拔高，以及将本来具有统一性的各种局部解释成彼此对立，并将本来是相互关联、没有绝对先后因果的关联关系解释成某些因素是决定性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资本、市场、逐利、政府等等这类本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中的正常局部的事物，一方面被无限拔高为决定性因素，以至于都快忘了还有“整体”，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意义又被简单、先验地标签化了。在地理科学的早期，曾经出现过环境决定论，后来又被简单批判，环境决定论其实是一再出现的未被彻底正确理解的“整体性局部”理论的样本。

5 结论

5.1 增长主义规划论落入的理论与逻辑陷阱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文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中国的增长主义，本质不过是政府将“发展”简单降维为“增长”，将“增长”又进一步简单降维为“扩张”而已，根本没有什么高级原因，把“增长主义”换成“扩张主义”就行了，实质不过是治理的低智商化而已。吴教授也多次提到了中国城市的“增长”实质是“扩张”。这种解释的确是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不是问题的根本。这类“偷换概念”式的问题，不会因为恢复“复杂化理解”就能得到解决。对复杂事物的局部化具有必然性，只是不应忘了局部是整体的局部、不应忘了整体。由于局部化具有必然性，所以基于现状逻辑的“复杂化”，由于没有清晰正确地理解“复杂”的内在机制（整体性、同时性逻辑等），最终仍将不可避免地走入其他的简单局部化，从而，同样的问题将会以新的形式重复，比如从扩张主义转为存量主义，转为生态主义，转为新兴产业主义，转为道德主义，转为民主主义，等等。不理解整体性，就一定落入“简单局部化”的陷阱——即便精巧如增长机器理论。简单局部化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本质——简单局部性解决的整体边际效益已经趋近于零乃至负值。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是认识到导致简单化理解的原因并不简单，进而解决它，这才是最有建设性的。

《为增长而规划》无疑也遇到了整体性这一事物的真正的复杂性及其微妙陷阱：发展、城市、规划、增长、公平、生态以及不同人群、不同人群的得失等都处于同一个整体中，整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关联着——自身的

^① 理论的无效的简单化，如把最初的规划简化为“物质规划”，而实际上任何成功的物质规划，无论理论的或实践的，都必定是整体效应优异的物质规划。理论的无效的复杂化，如范畴的无限扩大化直至“everything”。

任何变化都会传导引起其他要素直至整体的变化（虽然有时极其细微），所以用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一定程度地解释其他要素直至整体，并且因为只要是这样一类整体，就总是存在这样的要素和这样的关联关系，所以在任何经验中都有办法找到支持这样的解释的证据——让理论看起来通过了检验。当这个要素与其他要素直至整体的关联关系被意识到（或者说被发现）并被抽象地表达（或者说建构），一个形式上的理论既已形成；然后，由于人们满意于对理论进行（其实只是有限的）检验证明，加上自身的某种立场性，以及急于得到简单美妙的“科学”答案的内心诉求，三者相结合，就使人们开始兴奋于新的事物本质（因为可以解释全部事物）的被发现，并且越想越对——只要他们一直沿着上面的路线思想、检验。

无论如何，现实的问题几乎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存在的合理性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多，这提醒学术需要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深思，虽然同时社会又应极大地宽容自由的猜想。这两方面的整合不难——需要的是真正把猜想当猜想而不是确切的答案，即需要我们提高让猜想通过检验的门槛（当然，即便通过检验，答案也仍然具有猜想的本质）。同时，这还提醒我们，学术需要更有独立性。这方面，习惯了“为政治讳”的我们，习惯了不批评，从而导致一些似乎有点政治敏感性的西方批评性理论逃避了真正地被彻底检验，导致我们在学术上的薄弱环节，最终落入未经充分检验的西方话语中心化的陷阱。学者的独立性，不是学术要不同于政治，而是学者要能够独立于一切思想而思想。

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复杂性，也就是不断突破最优整体性的天花板的挑战性。整体中的各个局部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决定了如果整体和谐性不能进一步提升，那么总和水平就只能停留在一定阶段，比如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普遍存在的强调单方面重要性、突出不同方面矛盾性、满足于“证伪”

（批评）的思维，只会误导人们更加从看似安全、简单的各种局部理论、局部政策，线性演绎局部解决方案，误导人们看不到事物的不同方面和相互间统一的可能，看不到寻找整体性解决的复杂性，甚至也理解不了现实中出现的整体性思维和整体效应很好的局部性解决的创造性和建设性。首先从局部性思维中摆脱出来，进而理解整体性解决不是很多方面的堆砌而是不同方面的有机整合，是要寻找能够实现最好的整体优化的局部干预，并用“整体价值观”替代“局部价值观”（实质是“未能远谋”的局部利

益观），结合思维的同时性逻辑和穷尽猜想，才能最有效地帮助现实拥有越来越多的正确解决方案，进而突破发展的天花板。

5.2 尾声：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

编辑部明确“字数不限”，但其实本文也只不过是力求彻底地认真研究透一个问题——达到研究的最优整体性。这也是学术的本分——学术之为“社会良心”的本质，不是站到“良心”或“道德”的高地，而是坚守真理的高地。

现在，让我们把脑洞再开大一点：吴教授无疑作出了勇敢的突破，且同样是整体性的突破——中国要拿出自己的《城市与区域规划》，改革开放的黄金三四十年，也是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的黄金三四十年；如果“为了增长的规划”的中心思想可以商榷，且事实上我们所能读到的没有未经主观“看见”和裁剪的客观，从而对这卷已经铺展开的“史书”的“撷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继续下去，那么，一个更好的中心思想可以是什么？

以整体主义的视野，一定程度上，这恰恰是一部人类前所未有的整体主义规划和实施的史书：试图把庞大复杂至超过10亿人、960万km²、拥有5000年历史、处于现代社会的复杂空间进行整体规划和实施，即便将视野放回到区域和城市尺度，也庞大到一省如一个世界大国，或一城如欧洲一国。这一整体主义的壮举不仅涉及巨大的尺度、复杂的功能、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的变与不变、干预与自组织，还有我们的改革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总之努力去统筹了压迫过来的各种因素和需求。在这些过程中，中国规划想了很多办法试图使如此大规模的整体统筹与发展得以实现。而从结果来看，同样以整体主义视野放眼世界，中国当然值得自豪，因为世界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整体战略性从而放任自流，要么考虑的全面细致程度远远不如我们——放任自由其实是所有人都最会做的一件事。

这部具有了整体主义规划与实施特征的史书，仅仅源于规划吗？当然不是，其背后有中国的具有整体主义特征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早就意识到了事物之间的相依共生关系和整体系统性，意识到了事物价值的非先验性、辩证性，从而最擅长于全局视野、通盘辩证确立目标和施策。但我们的文化显然未能彻底深入这种性质的确切内涵和逻辑，形成严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指导对具体事物的“全部”和“整体性”的自觉认知。最终，在社会前进所必然遇到的越来越复杂的整体性挑战面前，加上常常表象为线性的西方

① 最好的知识在本质和产生的认识论、方法论上其实都符合整体性以及其中的同时性逻辑等，但在整个思想领域并没有形成整体论自觉的情况下，解释出来的都成了线性的。这也启示我们，“尽信书”的几乎一定被误导。

理论^①的冲击，我们的社会虽仍然有整体主义风范，但在实践和思路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先验、线性、局部化（包括局部堆砌化）的特征。于是，就出现了吴教授实际上批评的不顾社会发展、牺牲资源环境而局部性地追求增长的规划；就出现了只顾强调自己局部的重要性，却不顾城市整体发展的机会成本，也不顾自身如何更好适应整体、协助构建有机整体的专业规划和专业部门；就出现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只关注大项目、大空间、增量空间、强政府和资本导向，却不重视小项目、小空间、存量空间、自组织和人本导向的规划和发展。而一旦某种新概念、新思想、新政策出来，又走向另一个局部、另一种极端，或者就是各种局部的简单堆砌，因为不知道要寻求和如何寻求在局部间构建有机整体性、不知道不应该先验化局部、不知道应该具体整体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寻求整体性最优的有限干预。就像当前，既要转型，又要稳定，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改革，又要依法治国，如何统一？先验化任何一个局部，显然都有问题，而含糊其辞的理论解释，只会让人更加不知所措。事物的整体性给我们的启示是：需要只唯真、唯实，而不唯任何先验绝对性，在具体整体中目标于最优整体性创新寻找具体的合理干预；并且我们能够想象，在最优整体性中，其实所有这些要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需要改革意味着现状整体性不优，而法律、政策等等构成的制度无疑是社会整体性的核心结构从而也需要改革，从而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宪法的根本价值正是要在很多都应该是可以变（包括法律、政策）但又要保持稳定、保持整体性最优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一个让合理的改变可以有序发生的最基础支点。显然，整体性和整体主义规划的复杂性为中国规划和社会设置了巨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力求整体思考、提供整体性解决、构建最优整体，应该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迄今为止的努力远没有达到最优的整体性，但对于中国规划师们为了协调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和并不完美的现实进行整体思维和规划的真诚与努力应该有一种基于理解的认同。

最后，回到霍尔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这本书的规划专业性的主旨，是回答规划作为一门学科、一个职业、一种行为以及一种知识或思想产品，如何演变成了，变成了什么。他的一个中心结论——虽然并不是他的创造——是规划成了一个过程。但是，当规划成了过程之后，是否就不再是蓝图了？其实不是，蓝图也还在，只不过可能变得更多，可以调整。所以，过程论只是认识到了规划这个整体的一个被遗忘或低估了的局部。而我们的规划理论，固然需要不断发现这样的被遗忘的局部，但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第一原则，却是整体，是把所有问题放到一起，是把整个空间放到一起，是把所有合理的原理放到一起，是把过去不可解

释但其实是我们所面对的同一个世界的悖论解释清楚，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更加和谐一致的知识、解决方法和世界，是从物质空间的局部帮助创造整体性变得越来越好的世界。笔者认为，规划理论从来就没有真正清晰地意识到和阐明这一点：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的诞生，不是因为社会改革的理想（很多理论家以为我们误读了《田园城市》，但实际上社会改革思想很多，为什么只有《田园城市》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也不是因为物质空间（对物质空间的处理也一直都有），而是先驱们给出了具有极为出色的整体效应的物质空间方案。整体主义的主题，是规划学科的最大主题，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规划已经撤退到越来越看不清自己是什么，或者“只做小规划”的时代，中国规划能够带给世界的虽然不完美但足够“示例性”的实证经验。

这样一本书的名字可以是：《不彻底的整体主义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Unthorough Holistic Planning: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让它来预见中国真正的整体主义规划和发展时代的到来。UPI

参考文献

- [1] 霍尔 P. 城市与区域规划 [M]. 邹德慈，金经元，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2] Wu Fulong. 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M]. RTPI, 2015.
- [3] Kuhn T S. The Essential Tensi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 // Kuhn T S.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225-239.
- [4] 张京祥，罗震东. 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 [M].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 [5]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Faludi Andreas. A Reader in Planning Theory [M]. Pergamon Press, 1973.
- [7] 王红扬. 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J]. 城市规划, 2000(6): 7-16.
- [8] 约翰·R. 洛根，哈维·L. 莫洛奇. 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M]. 陈那波，等，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9] Wildavsky Aaron. 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 [J]. Policy Sciences, 1973(2): 127-153.

（本文编辑：张祎娴）